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语言政策

——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以〕博纳德·斯波斯基 著

张治国 译 赵守辉 审订

 商务印书馆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语 言 政 策

——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以]博纳德·斯波斯基 著

张治国 译

赵守辉 审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商 务 印 书 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 (以) 斯波斯基著; 张治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7414-8

I. ①语… II. ①斯…②张…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5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言 政 策

——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以〕博纳德·斯波斯基 著

张治国 译

赵守辉 审订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414-8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38.00 元



作者简介

博纳德·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是以色列巴依兰大学 (Bar-Illan University)
荣休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研究中心
(NFLC) 高级研究员、上海海事大学语言政
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名誉所长。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顾 问

陈 骏、陈章太、戴庆厦、李 嵬、李宇明

主 编

徐大明

副主编

王铁琨、姚小平、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按音序)

蔡永良、陈 敏、陈新仁、丁言仁、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郭龙生、郭 熙、刘丹青、王海啸、王建勤、王铁琨、徐大明、姚小平、
赵蓉晖、周洪波

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

——序《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李宇明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指政府、社会组织或学术部门等对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所做的干预、管理及相关计划,其中包含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等内容。研究语言规划的学科可称为语言规划学。

传统上,语言规划可分为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内容较多涉及语言政策,比如国语的选择、民族共同语的确定等等。本体规划是在地位规划的前提下进行的,目标是促进国语、民族共同语等这些有社会地位的语言不断规范、完善,使其能够很好发挥地位规划赋予的语言职能。本体规划的内容,包括文字的创制与改革,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规范,拼音或注音方案的创制,以及各种语言技术的发展等等。今天常说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基本内容都属于语言的本体规划。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语言规划者认识到,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管理语言生活,而不是管理语言,虽然管理语言生活必然会涉及语言本体。语言生活在哪里?在各行各业中,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因此,管理国家语言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各领域的语言生活,为各领域做“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见李宇明《语言功能规划刍议》,《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语言功能规划,是在语言地位规划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确定各种语言文字(及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规划各个社会领域怎样综合发挥各种语言文字的作用,目的在于使各种语言文字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构建起多种语言现象互补共生、和谐相处的“多言多语”生活。

人类语言规划的活动早已开始,但是语言规划学却十分年轻。1959年,豪根(Haugen)最早提出语言规划的概念,之后涌现出一批语言规划的

经典著作,如《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Fishman, Ferguson and Das Gupta 1968)、《语言可以规划吗?——专为发展中国家所用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践》(Rubin and Jernudd 1971)、《语言规划的进展》(Fishman 1974)等。这些著作奠定了语言规划学的基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规划研究仿佛走入了低谷,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又重受关注。这得益于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思潮,如新一轮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性的大移民,复苏的族裔—民族主义,语言危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一批新国家的出现等。据研究,当前国际语言规划研究表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急速扩展。除传统的研究内容之外,又增添了当代语言生活的许多问题,如语言认同,语言复兴,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的语言权利,双语教育,全球化与语言多样性,语言的国际传播,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语言信息化等等。

第二,研究视野涉及全球。过去,语言规划主要关注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而今的研究视野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等移民国家、西方老牌的单一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各种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等,它们的语言问题都引起了语言规划者的浓厚兴趣。可以说,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都纳入了语言规划的研究视野。

第三,研究观念发生转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多样性常被看作社会麻烦,看作阻碍国家建设的离心力量。那时语言政策的宗旨,就是确定单一或有限的官方语言,并尽力去完善、推广。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最近 10 年,人们对待语言多样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各种语言及其变体,被看作是值得珍视、应当努力保护的人类公共财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文件,欧盟的一长串官方语言名单,便是维护语言多样性这一态度的具体体现。

第四,多学科共同参与。语言生活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语言规划绝不仅仅是规划语言,规划的是众多学科共同关心的社会语言生活。事实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民族学、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都已纷纷进入语言规划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规划正在成为政治家关心、多学科参与、影响国家与国际新秩序建构的学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语言规划的国家之一。先秦诸子早就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言语行为规范。孔夫子主张“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提倡在庄重场合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

语·述而》)。战国时代的鸿儒子思,在《中庸》中已有“书同文”的记述,虽然其真其伪后世莫辨,但在秦国席卷天下、横扫六合之时,确实以政府力量推行了“书同文”政策,用小篆统一了六国文字。北魏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进行了著名的语言改革。历史上许多朝代都颁布过字书、韵书,统一文字、音韵等标准。特别是从清末到民国,语言规划的实践进入现代阶段,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等,都汇入到救亡图存的滚滚历史洪流中。新中国实行语言平等政策,普通话推广、汉字改革、少数民族文字设计、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等重大语言规划,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语言权利、和谐语言生活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国有悠久而广泛的语言规划实践,有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法规与言论,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但是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却不怎么理想。其一,对中国语言规划的三千年历史缺乏系统梳理,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缺乏科学总结,对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缺乏全面研究,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缺乏逻辑预判。其二,对世界各国语言规划的情况了解不够、研究不够,对各种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关注不够、参与不够,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成果介绍引进不够。其三,没有全面及时地向外介绍中国语言规划的情况,因而也妨碍了国际语言规划学界从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中汲取学术营养。

当前,中国语言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多言多语”生活正在形成,解决语言矛盾,维护语言权利,做好语言服务,成为国家重要的语言文字工作。第二,混合型语言交际方式(人与人的交际、人与机器的交际、机器与机器的交际)已经实现,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快速发展,社会正在产生一批新的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空前密切。第三,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步伐空前加大,国外语言生活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第四,公民的语言能力关乎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已经写入国家的语言规划,并且也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需要国家解决的事件,国家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当然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能够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

在语言生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显然需要更为科学的语言规划;科学的语言规划显然需要语言规划学的支撑,语言生活的现实呼吁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语言规划经典译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酝酿多年,列入译丛的都是本学科的经典之作,并聘请外语水平高且谙熟专业的行家进行翻译。遴选经典的过程得到了国外专家甚至作者本人的大力支持,翻译过程又有专家团队支援,完稿之后再经专家认真审订。这种“精品意识”和严谨的操作,本身也具有“经典性”。

大约是 2004 年,一些学界同人曾经建议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从政府的角度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的现状;《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语言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语言生活黄皮书》,介绍国外语言生活状况,并及时引入国际语言规划的学术成果。数年过去,《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已形成 AB 两个系列,其中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从 2005 年开始逐年发布,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也曾数度开会,数拟提纲,但因其工作难度大,至今仍是理念之物。《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大约可以看作《语言生活黄皮书》的一部分,它的出版,把语言生活系列“皮书”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套丛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促进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并可以为中国语言生活的规划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2011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

本书献给艾莉歇瓦(Elisheva)、约那坦(Yonatan)、艾利亚胡(Elijahu)(一位语言管理者)、大卫(David)和耶尔(Yair)! 因为他们都与我讨论过他们自己的家庭语言政策。

中文版前言^①

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和复杂的社会语言生态,这为中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的语言管理历史悠久,近些年来,中国对许多涉及大众利益的重大语言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研究汉语书写系统的本质。汉语的书写系统是统一各种汉语变体之基础,当中国把提高人们的读写能力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来对待时,简化复杂的汉语书写系统就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人当中,德范克(DeFrancis 1977;1984)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先驱。最近,华裔学者赵守辉和澳大利亚学者小巴尔道夫(Zhao & Baldauf Jr. 2008)进行了该领域的合作研究。另一个在该领域研究的华裔学者是周明朗(Zhou 2004),他与人合作编著了《中国语言政策:1949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的语言政策,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改革汉语书写系统的问题,为方便中国广大地区间的信息交流而推广一种全国通用语(即普通话)的问题,以及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世界各地有关语言政策的正式研究都还相当年轻。豪根(Haugen 1966)对挪威语书写系统的开创性研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该研究往往被视为语言政策研究新趋势之滥觞。同时,该研究还与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新独立国家所积极开展的语言规划活动齐头并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开始出现了众多至今依然重要的研究热点:如何处理语言地位和相关语言的培育(或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多重复杂关系问题(Kloss 1966);语言少数民族的命运和待遇问题以及弱势语言的保持问题(Fishman 1966);语言多样性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Fishman, Ferguson & Das Gupta 1968);语言书写系统的管理问题(Fishman 1978)和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性问题(Cooper 1989)。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认为,“语言规划”收效甚微,大家对语言规划行为的评价众说纷纭,而且

① 本书的全部脚注均由译者所加,书中不另外注出,特此说明。

这些评价还难以说清道明(Rubin, Jernudd, Gas Gupta, Fishman & Ferguson 1977)。鉴于此因,近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奈科瓦皮尔(Nekvapil 2006)之后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在拙作中,都更喜欢使用“语言政策”这个大众化术语。其他人也都跟着使用这个术语,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一位教授,确切地说,是一位研究企业管理的教授,他在一个有关语言政策的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是在讨论“策略”而不是在讨论“规划”。

语言政策领域依然发展迅猛:超国家组织(例如,欧共体)变得更加复杂(Nic Shuibhne 2008);扭转语言转用的努力(Fishman 1991),尤其是扭转濒危语言转用的努力在不断加强(Fishman 2001);由人口迁徙而导致的多语现象日益增多(Extra & Yagmur 2004);语言权实施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人们对语言权本质的探索更加深入(Kymlicka & Patten 2003; Lutz 2007);科技发展对社会语言的影响效果越发显著——人们曾经认为互联网将会是英语的天下,可是,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互联网对语言的多样性具有支持性作用(Danet & Herring 2007),而且,当下人们正在利用互联网来激活受到生存威胁的弱小语言。所以,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版发行了不少有关语言政策的学术书刊,并组织召开了有关语言政策的学术会议。

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中国学者已经关注到西方的这些发展潮流,但是他们只关注到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发展潮流尚未被关注到。这本书是我首次尝试总结和介绍当代语言政策研究的成果,我很高兴听说它要被翻译成中文。在此,我对所有做出这个翻译决定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随着中国对语言政策研究兴趣的日益加大,两年前中国相继成立了两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一个是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另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前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汉语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后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外语的政策。拙作的中文翻译受到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尤其是该中心的主任徐大明教授的大力支持。该中心目前正在研究几个重要课题,这些课题清楚地反映了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目标。这些课题有:中国语言普查的研究、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研究、方言接触和共同语的研究、城市农民工语言问题和语言适应的调查研究、就中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语言问题与欧盟多语事务委员会合作进行的系列研究、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的历史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试点研究。

另外,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决定出版语言规划经典著作系列丛书。在上海海事大学张治国博士的建议下,《语言政策》被纳入了这套丛书。他也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外

语研究中心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语言政策研究,在经过竞争筛选后成为本书的翻译。我衷心地感谢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本书的译者和审订者,他们的这个决定使得本书得以被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同时,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认可,本人对此深感荣幸。

此书的写作改变了我的研究兴趣,我从此开始思索语言管理和语言政策方面的问题。尽管我第一篇有关语言管理和语言政策方面的论文早在1971年就发表了(Spolsky 1971),但是直到20年后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外语研究中心拜访了许多研究员后才开始弄清楚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在那里,我与美国国家外语研究中心的首位主任理查德·兰博特(Richard E. Lambert),该中心的行政和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研究员,例如理查德·布莱希特(Richard Brecht)、罗纳德·沃尔顿(Ronald Walton)、凯瑟琳·英格尔德(Catherine Ingold)、约翰·特瑞姆(John Trim)、伊兰娜·肖哈米(Elana Shohamy)等都进行过交流。他们的言谈都有助于我提高对语言政策的理解。在我的学术论文中,第一篇在论文题目中包含了“语言政策”术语的论文是1996年发表的(Spolsky 1996)。之后,我与伊兰娜·肖哈米共同研究了以色列的主要语言政策(Spolsky & Shohamy 1999)。后来,我利用学术假以高级访问研究员的身份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科里奇—帕克分校)的高级语言研究中心^①。在此,我有机会竭尽全力地整理本人在语言政策领域的研究思绪。经过出版社编辑的精心编审,书稿内容有所削减,定稿于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语言政策》一书提出了语言政策的三个成分,它们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第一个成分是关于言语社区的社会语言生态: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实际上使用什么语言。这一成分或多或少地相当于已故戴尔·海姆斯(Hymes 1974)所指出的言语交际民族学的特点,即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使用者都不能脱离社会语言生态这一环境。第二个成分是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Silverstein 1998):言语社区的成员是如何珍惜这些语言的以及他们认为大家应该怎样做才是恰当的。第三个成分是从活动者的维度来考虑的,即人们为语言管理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修改别人的言语和语言信仰而付出的努力。最近,我写了一本书——《语言管理》,该书详细地论述了语言政策的第三个成分(Spolsky 2009)。《语言政策》一书

^① 美国国家外语研究中心和美国高级语言研究中心都在马里兰大学(科里奇—帕克分校),这两个中心都属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中心,它们的研究成果为美国联邦政府服务。由于马里兰大学科里奇—帕克分校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很近,仅几站地铁之遥,该大学在许多方面与华盛顿联系密切。

从国家和社区的广大范围分析和描述了语言政策这一模式的各个方面,并且从家庭到民族国家甚至到更大的层面描述了个人、群体和机构(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修改语言的使用和改变语言的价值)对于语言使用的目的和技能。语言政策日益重要,本书提出的模式为语言政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框架。尽管我已经从活跃的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我还在继续研究语言政策领域中的相关问题。例如,我正在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语言政策大全》一书,该书将由 40 多章构成,各章的撰稿人都是世界各地在语言政策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本书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阐述语言政策领域的状况。

我希望《语言政策》一书的中文译本也将是语言政策研究进程中一个有价值的台阶。中译本可以把该书的思想展现给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家,以便他们能够把该书的思想应用到中国复杂的语言实践中去,并且通过与中国思维和中国学术研究的融合能够对该书的思想加以完善并提出挑战,我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这样做。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合作的培养以及跨越学术门第之见和地理空间之隔而进行的自由的思想交流。我能参与这个过程感到非常荣幸。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09 年 11 月于耶路撒冷

参 考 文 献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net, Brenda, & Herring, Susan C. (Eds.). (2007). *The Multilingual Intern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Francis, John. (1977). Language and script reform in China. In Joshua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creation and revision of writing systems* (Reprinted from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ed., pp. 122—148).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Extra, Guus, & Yağmur, Kutlay (Eds.). (2004).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Europe: Immigrant minority languages at home and school*.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Fishman, Joshua A. (Ed.). (1966).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non-English mother tongues by America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The Hague: Mouton.
- Fishman, Joshua A. (Ed.). (1978). *Advances in the creation and revision of writing systems*.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 Fishman, Joshua A. (Ed.). (2001).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Clevedon, Av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Fishman, Joshua A., Ferguson, Charles A., & Das Gupta, Jyotirinda. (1968).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Wiley.
- Haugen, Einar. (1966).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Modern Norwegi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ymes, Dell.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loss, Heinz. (1966). German—American language maintenance efforts. In Joshua Fishman (Ed.),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06—252). The Hague: Mouton.
- Kymlicka, Will, & Patten, Alan (Eds.). (2003). *Language rights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tz, Ellen. (2007). Recognizing indigenous peoples' human rights. *Cultural Survival Voices*, 5.
- Nekvapil, Jiri. (2006). From language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Sociolinguistica*, 20, pp. 92—104.
- Nic Shuibhne, Niamh. (2008). EC law and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Xabier Arzoz (Ed.), *Respect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pp. 123—143): John Benjamins

- Publishing Company.
- Rubin, Joan, Jernudd, Bjorn, Das Gupta, Jyotirindra, Fishman, Joshua A. , & Ferguson, Charles A. (1977).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
- Silverstein, Michael. (1998). The uses and utility of ideology: a commentary. In Bambi B. Schieffelin, Kathryn A. Woolard & Paul V. Kroskrity (Eds.),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pp. 123—145).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ernard. (1971). The language barrier to education. In George E. Perren (E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p. 8—17). London: CILT.
- Spolsky, Bernard. (1996). Prologemena to an Israeli Language Policy. In Tina Hickey & Jenny William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5—53). Dublin and Clevedon: IRAAL/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Spolsky, Bernard.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ernard, & Shohamy, Elana. (1999). *The languages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Zhao, Shouhui, & Baldauf Jr., Richard B. (2008). *Planning Chinese characters: Reactio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Zhou, Minglang (Ed.). (2004).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49*.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Springer Science.